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663/2023

(司法上訴卷宗)

日期：2024 年 11 月 14 日

司法上訴人：A · B · C

上訴所針對之實體：行政長官

一、概述

行政長官(以下簡稱“被訴實體”或“上訴所針對之實體”)於 2023 年 6 月 30 日作出批示，宣告時任行政長官於 2004 年 6 月 14 日批准 A、B 及 C(以下簡稱“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及隨後的居留許可續期行為無效。

司法上訴人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司法上訴，並在起訴狀中點出以下結論：

“a. 投資居留申請人 D 先生，根據第 14/95/M 號法令第四條第二款 b) 項之規定，請求為配偶之未成年直系血親卑親屬，即司法上訴人，申請在澳門定居。

b. 2004 年 6 月 14 日，司法上訴人均獲批臨時居留許可，並於 2004 年 9 月 15 日首次獲發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於 2011 年 6 月 13 日，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獲批准均滿 7 年而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c. 然而，由於司法上訴人的母親 E 女士與申請人所締結的婚姻被法院宣

告為虛假，於 2023 年 8 月 10 日，D 收到通知，獲悉行政長官的以下決定(下稱“被上訴行為”):

1. 於 2004 年 6 月 14 日批准三名司法上訴人的本澳臨時居留許可的行為被行政長官宣告為無效；

2. 相關的隨後行為(於 2007 年 10 月 12 日及 2010 年 5 月 28 日批准其等續期的行為)亦為無效(與上項統稱為“宣告臨時居留許可無效的行為”);

3. 同時不賦予司法上訴人《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所定的假定法律效果。

d. 在給予應有的尊重下，司法上訴人不同意行政當局的上述決定，故提起本司法上訴。

e. 司法上訴人的母親 E 女士與申請人 2002 年締結婚姻，當時，三名司法上訴人均為未成年人，分別約為 15 歲、10 歲及 9 歲，其等對於母親是否與申請人締結婚姻的事情並不知悉亦無相關的理解及思考能力，對於年幼的她們而言，只是跟隨母親到澳門生活。

f. 來澳門定居後，三名司法上訴人在澳門讀書、在澳門成長，接受澳門的本土文化教育並以此 20 年來一直以澳門為生活中心，至今，司法上訴人已在澳門居住了近 20 年，並且以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在澳門居住近 12 年。

g. 第一司法上訴人與澳門永久性居民 F 結婚、誕下一名兒子、在澳門有穩定的家庭及工作，為澳門娛樂事業的持續發展默默貢獻近 15 年，亦加入了 XX 會作為永久會員，完完全全融入澳門，且更選擇在澳門購置不動產，正正體現欲長久在澳門居住的意向。

h. 第二司法上訴人與 G 結婚、誕下兩名女兒、在澳門有穩定的家庭及工作，為澳門零售事業的持續發展默默貢獻。

i. 第三司法上訴人與澳門永久性居民 H 維持事實婚關係，誕下一名女兒及一名兒子、在澳門有穩定的家庭。

j. 司法上訴人認為宣告臨時居留許可無效的行為屬可撤銷，理由如下：

k. 第一，被上訴行為根據初級法院第 CR3-21-0148-PCC 之刑事判決，指 D 及 E 締結虛假婚姻，且製作一系列虛假文件，尤其多份《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申請書》、《物業登記書面報告》及《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指控行政當局以虛假聲明及文件為基礎，批准三名司法上訴人臨時居留許可，因而認為應屬無效。

l. 被宣告虛假的僅僅是 D 及 E 之間的婚姻關係，與司法上訴人直接有關的申請文件及關係聲明並未存有虛假，《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申請書》中僅聲明 E 為 D 的妻子，而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獲批准的依據是《出生證明書》，證實彼等為 E 的女兒而取得居留許可，有關的母女關係是真確的，故並不符合第 16/2021 號法律第 7 條第 1 款中宣告無效所要求的虛假文件或聲明之要件，有關的行政行為亦沾有法律前提錯誤的瑕疵。

m. 第二，就善意原則方面，司法上訴人並不知悉，亦沒有參與虛假婚姻的違法行為，而其等在此批給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中為善意地行事；為此，行政當局亦應依善意規則行事及建立關係，以保護的個人合理期盼和既得權利的一般法律原則。

n. 司法上訴人獲批准在澳門生活近 20 年，已經占據了其三分之二的人生，已長期產生對澳門產生歸屬感、以澳門為生活中心，並且信任對自身作為澳門人，並將會繼續一直作為澳門人的事實，其已經對居留許可產生了正當期待及合理信任。

o. 至於既得權利，司法上訴人均在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時已取得並享有澳門《基本法》所賦予的居留權。

p. 就保護居民權益原則及適度原則方面，司法上訴人並不知悉違法行為，如今卻需要因違法行為而失去在澳門的一切家庭、事業等，並且為司法上訴人的配偶及兒女帶來不可挽救的傷害，宣告居留許可無效導致其家庭支離破碎，有關

行政行為明顯違反適度原則。

q. 被上訴行為明顯違反保護居民權益原則、適度原則及善意原則。

r. 第三，司法上訴人在 12 年前已領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居留權屬既得權利，不應受剝奪，而澳門基本法亦沒有授權下位法律可以訂立剝奪已取得之居留權。

s. 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24 條的規定，宣告臨時居留許可無效的行為因此沾有可撤銷的瑕疵，如尊敬的法官閣下不認同屬可撤銷，則懇請補充考慮以下有關針對行政當局不賦予《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規定假定法律效果的決定的司法上訴請求。

t. 《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之規定，在宣告行政行為無效的情況下保留相關法律效果，取決於以下前提：(i) 因時間經過；(ii) 按法律一般原則。

u. 針對第一項要件，根據時間推移原則，正如中級法院的第 833/2021 號裁判書指出：一個無效行為只要經過時間推移，就可以產生法律效力，學者認為產生效力所需的時間應交由法律解釋者決定；而中級法院認為，如已達至成年，自作出被視為無效的行為之日起，就賦予永久性居民身份而言，可以與法律所要求的 7 年相同。

v. 針對第二項要件「按法律一般原則」，就無效行為所產生的事實情況賦予法律效果，學說作出了回應，一方面要平衡合法性的價值，另一方面要平衡法律確定性和決定穩定性的價值，尤其需要保護公民的善意及信賴。

w. 《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第 162 條第 3 項，亦明文規定在賦予法律效果應根據善意原則、保護信任原則、適度原則或其他憲法法律原則，尤其是與時間的推移有關的原則作出衡量。

x. 澳門終審法院第 96/2022 裁判書中指出：如保護信任、善意、平等、公正無私、適度、公正、不當得利及實現公共利益等原則，可以依據這些「法律一般原則」限制行政當局的原則去解決某一無效行政行為而衍生的不公正情況。

y. 重申本結論第 m 至 q 項的論述，縱使宣告行政行為無效，應根據適度、保護信任、善意等原則，依據這些限制行政當局的原則，去解決某一無效行政行為而衍生的不公正情況，在實現公共利益的同時，亦避免或盡量減低對善意的司法上訴人及其家庭帶來的負面影響，從而可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之規定，對從無效行為中衍生之事實情況賦予法律效果，保留三名司法上訴人的居留權。

z. 被上訴的行政行為意見書第 15 段指出，「合法性原則作為行政法眾法律原則之首，其他一般性原則均不能對抗甚至違反合法性原則」，應認為行政當局僅以堅守「合法性原則」為由，漠視其他法律原則，完全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所指的例外情況，即可以按上指的「法律一般原則」，保留從無效行為中衍生的某些效果的情況。

aa. 被上訴的行政行為意見書第 13 段指出，「即使有關虛假身份資料並非由三名女兒向本局提供，其等沒有參與該導致臨時居留許可無效的犯罪行為，但該行為是為着其等利益作出...」，然而，應認為虛假婚姻中，直接受惠者以及欺騙者僅僅是司法上訴人的母親，而司法上訴人當年不知悉有關犯罪行為且未成年，她們並沒有照顧自己的能力，其等只是、亦只能依賴及單純跟隨母親來澳門，別無他選；其等並沒有任何過錯，亦非有關行為的主要得益者，無效行為明顯不是為着其等利益作出。

bb. 承上，與其他判例(例如虛假親子關係)的情況不同，虛假婚姻關係存在於 D 及 E 二人之間，而非存在於司法上訴人的直接親子關係範圍中，三名司法上訴人僅僅是 E 的後代，僅因上一代犯事而無辜被牽涉其中並承受惡果；故有必要根據保護信賴、善意以及適度原則限制行政當局宣告無效的範圍。

cc. 終審法院第 76/2015 號裁判書及葡萄牙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均認為 – 只有導致行為無效的犯罪者/欺詐者才不能根據無效行為中衍生之事實情況受益 – 而絕對並非指三名司法上訴人的情況。

dd. 澳門立法會就第 16/2021 號法律公布的立法文件，第 4/VI/2021 號意見書指出，立法者曾解釋居留許可被視為無效時對善意第三人所產生的影響，例如當虛假聲明是由第三人的家屬所作出，而該第三人在其家屬作虛假聲明事實之日仍為未成年人，而現時已在澳門長期居住(例如二十年或三十年)，在特殊情況下，即使是欺詐者，但已經成為永久性居民很久時間，仍可能會承認其居留許可的存續，立法者更指出，有關的法律上的解決方案正正是《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更何況，司法上訴人正正是屬於善意第三人的情況，她們並不是欺詐者，亦不是法律所應懲罰的對象。

ee. 中級法院的第 833/2021 號裁判書持類似見解，認為與犯罪行為無關的善意主體未被限制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受益的可能性，對此更應遵循善意原則而應獲保護。

ff. 如果任由行政行為的無效效果一直延伸至後代而沒有範圍及限制，這顯然是違反適度原則的。

gg.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僅因為上一代的違法行為而無辜受到牽連，導致在澳門建立已久的事業、住屋及家庭，均需要全部放棄，司法上訴人所辛苦建立及經營數十年的一切社會及家庭穩定關係將變得一無所有，需要到陌生的城市重新生活，後果是完全無法想象的，這正正是《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所指，無效行為所衍生的不公正的情況。

hh. 且更為司法上訴人的配偶、兒女、家人帶來不可挽救的傷害，家中老幼，甚至有殘疾證的殘疾奶奶無人照顧，家庭支離破碎。

ii. 三名司法上訴人並不知悉違法行為，保留假定效果並不屬違反公共利益；反之，不保留假定效果的被上訴決定嚴重影響私人利益。

jj. 由此可見，行政當局不賦予假定法律效果的決定，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的規定，以及明顯違反保護居民權益原則、適度原則及善意原則。

kk. 最後，有關宣告臨時居留許可無效的行為尤其違反以下法律規定及原則：

- a. 違反第 16/2021 號法律第 7 條之規定；
- b. 違反保護居民權益原則(行政程序法典第 4 條)；
- c. 違反適度原則(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第 2 款)；
- d. 違反善意原則(行政程序法典第 8 條)。
- e. 違反《基本法》第 24 條所賦予的居留權之既得權利。

ll. 針對補充請求，有關不賦予假定法律效果的決定，尤其違反以下法律規定及原則：

- a. 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規定)；
- b. 違反保護居民權益原則(《行政程序法典》第 4 條)；
- c. 違反適度原則(《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第 2 款)；
- d. 違反善意原則(《行政程序法典》第 8 條)。

mm. 綜上所述，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24 條的規定，被上訴行為因此沾有可撤銷的瑕疵。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20 及第 21 條第 1 款之規定，因被上訴行為違反法律及法律原則，以及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21 條第 1 款 d)項之規定，行政當局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有明顯錯誤及絕對不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構成司法上訴的依據。

基於上文所述之事實及法律依據，懇請尊敬的法官閣下作出以下決定：

1. 裁定本司法上訴理由成立，並撤銷宣告臨時居留許可無效的行為，以及其後的法律後果；

2. 如尊敬的法官閣下不認同宣告臨時居留許可無效的行為屬可撤銷，則懇請補充考慮並裁定撤銷行政當局不賦予假定法律效果的決定。

3. 傳喚被上訴實體以使其若願意的話進行答辯，並將有關行政卷宗附入本案卷。”

*

上訴所針對之實體提出答辯並點出了以下結論：

“I. Não há dúvidas que o acto impugnado se fundamentou, de facto, nos crimes cometidos por E e D.

II. Esses crimes foram determinantes da prática dos actos declarados nulos.

III. A lei determina que o acto que resulte da prática de um crime é nulo.

IV. Verificada a nulidade de um acto, a Administração está vinculada a declará-la.

V. Os princípios gerais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não são aplicáveis aos actos vinculados.

VI. O art. 123, n. 3 do CPA concede à Administração um poder discricionário.

VII. Só o erro manifesto ou a total desrazoabilidade provocam a anulabilidade do acto discricionário.”

*

司法上訴人提交了非強制性陳述，並重申其立場。

*

本法院對此案有管轄權，且訴訟形式恰當。

雙方當事人享有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正當性及訴之利益。

不存在可妨礙審理案件實體問題的延訴抗辯及無效情況。

二、理由說明

根據本案卷宗及行政卷宗所載的資料，本院認定以下對審理本司法上訴具有重要性的事實：

D 以投資不動產為依據，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出了臨時居留許可申請。

該申請惠及其配偶 E、尊親屬及配偶的三名卑親屬 A、B 及 C(即司法上訴人)，她們因此獲得了臨時居留許可，及後也取得了澳門居民身份證。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於 2022 年 3 月 4 日作出裁判，裁定 D 及 E 以直接共同正犯、連續犯及在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五項偽造文件罪，判處每項各兩年九個月徒刑，數罪並罰後各判處四年的單一徒刑。

D 及 E 不服初級法院的裁判，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中級法院刑事合議庭於 2023 年 2 月 16 日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的工作人員於 2023 年 6 月 12 日製作了編號為 PRO/01265/AJ/2023 的建議書，內容如下(詳見卷宗第 42 至 48 頁)：

“事由：建議宣告批准利害關係人臨時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無效 (第 1601/2002 號、第 1601/2002/01R 號及第 1601/2002/02R 號卷宗)

投資居留及法律廳 XXX 高級經理閣下：

1. 申請人 D，根據第 14/95/M 號法令第一條第一款 b)項、第二條第一款 d)項及第四條的規定，以不動產投資為依據於 2004 年 6 月 14 日獲批其本人及下述家團成員的臨時居留許可，相關利害關係人的臨時居留許可資料如下：

序號	姓名	關係	臨時居留許可有效期至
1	D	申請人	2013/06/14
2	E	配偶	2013/06/14
3	I	尊親屬	2013/06/14
4	A	配偶卑親屬	2013/06/14
5	B	配偶卑親屬	2012/01/15

6	C	配偶卑親屬	2012/01/15
---	---	-------	------------

2. 根據第 1601/2002 號卷宗第 23 頁至 32 頁、58 頁至 75 頁所載的由申請人於 2002 年 10 月 31 日向本局提交的離婚公證書、民事調解書、親屬關係證明書及結婚證明書，顯示 E 與 J 於 2002 年 10 月 8 日在內地離婚，二人的女兒 A、B 及 C 均由其母親 E 負責撫養；申請人與 E 於 2002 年 10 月 11 日在內地登記結婚；而申請人成為上述三名女兒的繼父。

3. 於是，申請人於 2002 年 10 月 31 日以不動產投資類別申請其本人及上述五名家團成員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並於 2004 年 6 月 14 日獲得批准，隨後於 2007 年 10 月 12 日及 2010 年 5 月 28 日獲批續期申請。申請人及五名家團成員已領取了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4. 然而，本局於 2023 年 3 月 6 日收到一份由中級法院送交關於本案中的申請人 D 及利害關係人 E 的刑事上訴案第 397/2022 號的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書(原審在初級法院第三刑事法庭第 CR3-21-0148-PCC 號普通刑事案)，該判決已於 2023 年 3 月 2 日轉為確定(見附件 1)，據此，獲悉以下已證事實：

1) 在案發之前，嫌犯 D(父親為 K、母親為 I)與嫌犯 L 為夫妻關係；嫌犯 J(為 K 的胞弟)與嫌犯 E 為夫妻關係，並育有三名女兒 A、B 和 C。

2) 2002 年(具體日期不詳)，上述四名嫌犯為能在申請本澳居留權時惠及更多家團成員，彼等共同計劃並達成共識，D 與 L、J 與 E 先離婚，後 D 與 E 假裝結婚，再由 D 作為申請人於 2002 年 10 月 31 日向貿促局申請在澳門的臨時居留許可，報稱與 E 為夫妻關係，為 E 三名女兒的繼父，同時申請惠及其等的臨時居留許可，並製作一系列虛假文件，尤其多份《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申請書》、《物業登記書面報告》及《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之後將有關載有不實內容的文件多次呈交予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目的是讓 E 及其三名女兒 A、B 和 C 的虛假居留申請獲得批准，從而使其等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

3) 澳門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合議庭於 2022 年 3 月 4 日裁定 D 及 E 以直接

共同正犯、連續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 6/2004 號法律第十八條第二款配合第一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五項“偽造文件罪”，判處每項各兩年九個月徒刑，在五罪並罰下，各處以四年的單一徒刑。

4) 其後，D、E 和 L 不服，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中級法院刑事合議庭於 2023 年 2 月 16 日裁定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判。

5. 由於澳門法院證實本案中的申請人 D 與配偶 E 在中國內地締結虛假的婚姻，並由申請人向行政當局提交載有不實內容的虛假聲明及一系列虛假文件，如《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申請書》、《物業登記書面報告》及《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使行政當局以該虛假聲明及文件為基礎作出了批准 E 及其三名女兒 A、B 和 C 的臨時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根據第 14/95/M 號法令第十一條補充適用現行第 16/2021 號法律第七條第一款的規定，有關行政行為屬無效行為。因此，本局於 2023 年 3 月 17 日向利害關係人發出書面聽證，根據郵政局簽收公函紀錄，有關書面聽證的公函於 2023 年 3 月 27 日已成功派遞(見附件 2)。

6. 利害關係人 A、B 和 C 透過被授權律師於 2023 年 4 月 6 日及隨後提交了回覆意見及相關文件(見附件 3)，主要內容如下：

1) 即便有關批給臨時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無效，三名利害關係人欲主張《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三款規定的假定法律效果：“不妨礙因時間經過及按法律一般原則，而可能對從無效行為中衍生之事實情況賦予某些法律效果”，理由如下：

2) 在母親被法院證實與申請人的婚姻為虛假，當時三名利害關係人分別約為 15 歲、10 歲及 9 歲，對於母親 E 是否與申請人 D 締結婚姻的事情並不知悉亦無相關的理解及思考能力，對其等而言，只是跟隨母親到澳門生活，其等自身並沒有作出任何違反行為以取得澳門居民身份，當中沒有任何過錯，證明了其等在批給居留許可的行為中為善意行事，故認為行政當局應依善意規則行事，以保護個人合理期盼的一般法律原則；

3) 三名利害關係人在澳門已經生活超過 20 年，在澳門組織家庭，A 在澳門購買不動產，A 及 B 在澳門有穩定的工作，其等兒女均在澳門讀書，不論是其個人或家庭生活，均與澳門建立一個穩定而深厚的關係；

4) 三名利害關係人已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根據澳門特區《基本法》的規定享有居留權，該居留權為利害關係人的既得權利，並不應被剝奪，而《基本法》沒有授權下位法律可以訂立剝奪已取得的居留權；

5) 同樣地，按照《行政程序法典》第五條第二款規定的適度原則，無效決定必然直接損害利害關係人的權利，並對其等的配偶和兒女帶來不可挽救的傷害；

6) 綜上，根據善意和適度原則，請求行政當局按照《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三款規定的賦予假定法律效果，即如決定宣告行為無效的同時，保留三名利害關係人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資格。

7. 就上述書面聽證回覆意見，茲分析如下：

1) E 及其三名女兒 A、B 和 C(下稱“四名利害關係人”)以申請人的家團成員，根據第 14/95/M 號法令的規定獲得在澳門的臨時居留許可及其續期，最終四名利害關係人亦取得了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2) 根據已轉為確定的初級法院第 CR3-21-0148-PCC 號案件的判決書，申請人和 E 並不是真正結婚，締結婚姻的目的是為四名利害關係人取得澳門的臨時居留許可及澳門居民身份證，兩人合謀在內地假裝結婚，並製作一系列虛假文件，尤其多份《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申請書》、《物業登記書面報告》及《持續婚姻關係聲明書》，並提交至本局，最終讓四名利害關係人取得澳門的臨時居留許可及澳門居民身份證，觸犯偽造文件罪，各被判處以四年的單一徒刑。

3) 毋庸置疑的是，申請人和 E 之間存在婚姻關係，是批准四名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的臨時居留許可這一行政行為在構成階段屬非常重要的事實和前提要件，沒有這一關係有關臨時居留許可不可能獲得批准。

4) 由於申請人和 E 之間的婚姻關係現已被法院證實為虛假，以致於 2004

年 6 月 14 日最初批給四名利害關係人臨時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因此而沾有錯誤瑕疵。

5) 根據現行第 16/202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第七條第一款規定，“一、以虛假聲明或虛假、偽造、經篡改的文件或屬他人的真確文件，又或以任何欺詐方式所取得的入境許可、逗留許可、居留許可，以及該等許可的續期及延期，均屬無效。”對於無效行為，不論有否宣告其無效，均不產生任何法律效果(《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款)。

6) 基於以上事實及法律依據，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款、第二款及第 16/202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第七條第一款規定，建議宣告於 2004 年 6 月 14 日批給四名利害關係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的行為無效，於 2007 年 10 月 12 日及 2010 年 5 月 28 日批給其等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的行為亦屬無效。

7) 值得一提的是，終審法院在第 154/2021 號案件作出的裁判中引述了中級法院在被上訴的合議庭裁決的觀點：“事實上，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所製定的《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居留制度》，主申請人獲批給的臨時居留權利可惠及當中第五條所規定的家團成員，而這些家團成員的臨時居留權利取決於主申請人獲批的臨時居留權利。儘管如此，主申請人與其家團成員的親屬關係僅為臨時居留權利受惠主體延伸的法律依據，而非予主申請人批給臨時居留權的法律依據。因此，在主申請人及其受惠家團成員獲批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程序中，如主申請人為繼續惠及其已離婚的配偶而就其婚姻狀況作出虛假陳述，誤導行政機關批准臨時居留許可續期，且權利人已因作出虛假聲明而被刑事法院判罪判刑，則行政機關可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 c 項，宣告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惠及主申請人的前配偶的部份無效……”；

8) 就本個案而言，由於該行政行為在作出的過程中牽涉到申請人和 E 的犯

罪行為，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 c)規定的擴張解釋結果，屬無效行為，申請人及 E 所實施的犯罪行為僅使得本來不符合惠及前提要件的四名利害關係人受惠於申請人的臨時居留許可及被不當續期，但有關虛假的婚姻關係並不是批給申請人和其母親 I 的臨時居留許可的法律依據，故按照上述司法裁判的見解，行政當局僅得依法宣告惠及四名利害關係人臨時居留許可和及後續期的行為無效。

9) 然而，律師主張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三款規定賦予假定法律效果，保留三名女兒 A、B 和 C 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資格。

10) 謹此引述終審法院第 76/2015 號案件之合議庭裁判：“A verdade é que também aqui há (pode haver) efeitos putativos ligados a outros factores de estabilidade das relações sociais, como os da protecção da confiança, da boa-fé, do *suum cuique tribuere*, da igualdade, da não locupletamento, e até da realização do interesse público-princípios que podem, todos, ser chamados a colmatar situações de injustiça derivadas da aplicação estrita do princípio da legalidade e da ‘absolutividade’ do acto nulo. Não pode, nunca, é assacar-se efeitos putativos favoráveis ao particular em cuja conduta se funda a nulidade do acto, como nos casos de coacção ou crime, ou até, simplesmente, de dolo ou má-fé do interessado.”

11) 須強調，《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三款所規定的無效行為倘有的假定效果，這是規定於同條文第一款的一般規定的一個例外。因此，須考慮在本案中是否從無效行為中衍生的事實情況賦予某些法律效果。

12) 有必要重申，在本個案中，四名利害關係人的澳門居民身份最初是透過虛假的資料而取得，現已證實其等不符合第 14/95/M 號法令的規定，行政當局必須依法宣告批給其等臨時居留許可的行為及其後的續期無效。倘仍承認四名利害關係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繼而讓其等繼續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則會導

致社會大眾誤以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是能夠透過虛假資料的手段而獲得，這等同於鼓勵他人利用此手段，助長有關不法行為和造就社會不良風氣，該做法完全不符合《行政程序法典》第四條規定的謀求公共利益原則。

13) 律師又主張三名女兒當時年幼不知悉有關犯罪行為，單純跟隨母親來澳生活。即使有關虛假身份資料並非由三名女兒向本局提供，其等沒有參與該導致臨時居留許可無效的犯罪行為，但該行為是為着其等利益作出，旨在讓其等取得一個不應獲賦予的權利，使其等能夠獲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因此，宣告批給三名女兒臨時居留許可的行為無效並無侵犯其等權利，因為其等本來便不享有在澳門居留的權利，自然不可能享有對永久性居民所給予的保障。

14) 澳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所規定的居留權僅僅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基本權利。

15) 最後，對於律師主張基於善意和適度原則請求保留三名女兒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資格，但應該強調的是，由於嗣後才發現三名女兒不符合法定要件的情況，本局應根據法律規定宣告有關行政行為無效，有關做法並無不妥之處，且合法性原則作為行政法眾法律原則之首，其他一般性原則均不能對抗甚至違反合法性原則。

16) 綜上，建議宣告於 2004 年 6 月 14 日批准利害關係人 E、A、B 和 C 臨時居留許可的行為無效，相關的隨後行為(於 2007 年 10 月 12 日及 2010 年 5 月 28 日批准其等續期的行為)亦無效，亦建議不賦予上述利害關係人《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三款所定的假定法律效果。

8. 綜上所述，鑒於澳門法院已證實申請人 D 與 E 之間的婚姻關係為虛假，二人已被法院判罪判刑，事實上 E 和其三名女兒 A、B 和 C 並不符合第 14/95/M 號法令的規定，致使最初批給其等臨時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因此而沾有無效的瑕疵，經進行聽證程序，建議呈請行政長官閣下，根據第 14/95/M 號法令第十一條補充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七條第一款的規定，宣告於 2004 年 6 月 14 日

批准利害關係人 E、A、B 和 C 臨時居留許可的行為無效，相關的隨後行為(於 2007 年 10 月 12 日及 2010 年 5 月 28 日批准其等續期的行為)亦無效；同時不賦予上述利害關係人《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三款所定的假定法律效果。

上述建議，謹呈上級審閱及批示。”

被訴實體於 2023 年 6 月 30 日作出了如下批示 (詳見卷宗第 42 頁)：

“同意建議書的依據及建議。”

司法上訴人不服決定，並於 2023 年 9 月 12 日提起本司法上訴。

*

檢察院助理檢察長就本司法上訴發表了以下寶貴意見：

“Nos presentes autos, as três recorrentes que são irmãs germanas solicitaram a anulação do despacho lançado na Proposta n.º PRO/01265/AJ /2023 (doc. de fls. 42 a 48 dos autos), no qual o Exmo. Senhor Chefe do Executivo declarou peremptoriamente “同意建議書的依據及建議”.

*

À luz do n.º 1 do art. 115.º do CPA, a expressa declaração de “同意建議書的依據及建議” implica necessariamente que o despacho em questão acolhe e absorve a Proposta n.º PRO/01265/AJ/2023 na sua íntegra, cujo ponto n.º 8 reza com precisão: 綜上所述，...，建議呈請行政長官閣下，根據第 14/95/M 號法令第

十一條補充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七條第一款的規定，宣告於 2004 年 6 月 14 日批准利害關係人 E、A、B 和 C 臨時居留許可的行為無效，相關的隨後行為（包括於 2007 年 10 月 12 日及 2010 年 5 月 28 日批准其等續期的行為）亦無效；同時不賦予上述利害關係人《行政程序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三款所定的假定法律效果 (sublinhado nossa)。

Este ponto n.º 8 conota que o despacho sob sindicância assume um acto administrativo composto, no sentido de conter duas decisões, traduzindo a 1ª em declarar a nulidade e a 2ª em indeferir o pedido formulado na audiência escrita (cfr. fls. 565 a 575 do P.A.), pelo qual as três recorrentes requereram a atribuição do efeito consignado no n.º 3 do art. 123.º do CPA.

No nosso prisma, as duas vertentes do despacho em causa explicam e justificam que as três recorrentes desdobram 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em “有關宣告臨時居留許可無效的行為” e “有關不賦予假定法律效果的決定”， portanto a nossa análise seguirá a estrutura da petição.

*

1. Quanto ao recurso da declaração da nulidade

Em relação à declaração da nulidade, as recorrentes arrogaram que o despacho em causa infringiu o n.º 1 do art. 7.º da Lei n.º 16/2021, os princípios da protecção de direitos e interesses dos residentes, da boa fé e da proporcionalidade, e ainda o direito adquirido de residência derivado do art. 24.º da Lei Básica.

1.1. Da arguida violação da Lei n.º 16/2021

A fim de substanciar a invocada violação do n.º 1 do art. 7.º da Lei n.º 16/2021, as três recorrentes teceram (conclusão 1 da petição): 被宣告虛假的僅僅是 D 及 E 之間的婚姻關係，與司法上訴人直接有關的申請文件及關係聲明並未存有虛假，《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申請書》中僅聲明 E 為 D 的妻子，而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獲批准的依據是《出生證明書》，證實彼等為 E 的女兒而取得居留許可，有關的母女關係是真確的，故並不符合第 16/2021 號法律第 7 條第 1 款中宣告無效所要求的虛假文件或聲明之要件，有關的行政行為亦沾有法律前提錯誤的瑕疵。

1.1.1. Ora, o Acórdão prolatado no Processo n.º CR3-21-0148-PCC que adquiriu já a força do caso julgado constata (vide. o 5 facto provado, sublinhado nosso): 2002 年 (具體日期不詳), 第四嫌犯 D、第五嫌犯 E、第六嫌犯 L 及第七嫌犯 J 為著向「貿促局」申請本澳臨時居留權並能惠及較多的家庭成員來澳定居，彼等共同商議後決定及計劃，第四嫌犯 D 與第六嫌犯 L 離婚，第五嫌犯 E 與第七嫌犯 J 離婚，當中，第五嫌犯 E 與第七嫌犯 J 所生的三名未成年女兒 A、B 及 C，由第五嫌犯 E 撫養。之後，第四嫌犯 D 與第五嫌犯 E 假裝結婚，以第四嫌犯 D 作為主申請人申請澳門臨時居留許可，有關申請同時惠及第二嫌犯 I、第五嫌犯 E 和第五嫌犯 E 的三名未成年女兒 A、B 及 C。待各申請人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資格後，第四嫌犯 D 與第五嫌犯 E 解除彼等婚姻關係，彼等各自與原配再婚，及後再向澳門身份證明局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第六嫌犯 L 及第七嫌犯 J 來澳定居。

À luz da ética rudimentar, não pode deixar de colher que o “plano” acima referido é, inegavelmente, um ardil ganancioso e malicioso. E esse ardil explica os 19 e 21 factos provados que comprovam firmemente que ao requerer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e os bilhetes de identidade da RAEM, o 4.º arguido e a 5.ª arguida apresentaram dolosamente a certidão de casamento falsificada ao IPIM e aos SIM.

Por sua vez, os factos provados 26 a 28, 57 a 59 e 69 a 71 tornam inabalável que a concess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às três recorrentes e as subsequentes renovações dessa autorização têm como pressuposto e alicerce imprescindíveis a sobredita certidão de casamento falsificada e a falsa relação conjugal entre o 4.º e a 5.ª arguidos.

E é de salientar acentuadamente que o Acórdão tirado no Processo n.º CR3-21-0148-PCC condenou judiciosamente “第四嫌犯 D 及第五嫌犯 E 以直接共同正犯、連續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 6/2004 號法律第 18 條第 2 款結合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五項偽造文件罪、判處每項各兩年九個月徒刑 (涉及申請人 D、E、A、B 及 C)”.

Tudo isto patenteia, com toda a certeza, que a sobredita conclusão 1 da petição é manifestamente distorcida e censurável, por isso, há de ser insubsistente a arguição da violação da disposição no n.º 1 do art. 7.º da Lei n.º 16/2021.

1.1.2. Repare-se que as três recorrentes obtiveram, pela primeira vez, os bilhetes de identidade em 15/09/2004 (docs. de fls. 391 a 395 do P.A.). Daí flui, com toda a certeza, que ficam cronologicamente anterior à entrada em

vigor da Lei n.º 16/2021 tanto a falsificação da certidão de casamento como os sucessivos usos dessa certidão falsificada pelo referido 4.º arguido ao requerer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e as respetivas renovações.

Nestes termos e à luz do princípio de tempus regit actum, pode-se concluir que a Lei n.º 16/2021 é inaplicável ao vertente caso, pelo que o despacho em escrutínio enferma a errada aplicação do n.º 1 do art. 7.º desta Lei, dado que o qual acolheu o ponto n.º 8 da Informação n.º PRO/01265/AJ/2023 e tal ponto n.º 8 menciona o n.º 1 do art. 7.º como sua base legal.

Porém, e com elevado respeito pelo melhor entendimento em sentido diferente, duas razões aconselham-nos a opinar que a violação pelo despacho in questio do n.º 1 do art. 7.º da Lei n.º 16/2021 é insignificante, não acarretando invalidade ao apontado despacho.

1.1.2/a. Ora, o 19 facto provado elencado no aresto tirado no Processo n.º CR3-21-0148-PCC atesta que o 1º requeriment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teve lugar em 18/02/2008. O que implica que se aplica ao vertente caso o CPA aprovado pelo D.L. n.º 57/99/M. À luz das alíneas c) e i) do n.º 2 do art. 122.º do CPA, são nulos os actos administrativos que constituam um crime ou que sejam actos consequentes de actos administrativos anteriormente revogados ou anulados.

Bem, os cinco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prudentemente aludidos no supramencionado aresto tornam inequívoco e concludente que os actos administrativos pelos quais às três recorrentes foi concedida e sucessivamente renovada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foram provocados directamente por esses cinco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Sendo assim e em conformidade com as jurisprudências relativas ao alcance do conceito "crime" previsto n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 122.º do CPA (vide. Acórdãos do TUI nos Processos n.º 11/2012, n.º 76/2015 e n.º 29/2018), colhemos que são inevitavelmente nulos os actos administrativos supra referidos.

1.1.2/b. Temos por sensata a inculca jurisprudencial, no sentido de que são actos consequentes cuja prática e conteúdo dependem da existência de acto anterior que lhe serve de causa, base ou pressuposto e que, assim, é dele raiz e fundamento (cfr. Acórdão do TSI no Processo n.º 707/2013).

De acordo com a alínea i) do n.º 2 do art. 122.º do CPA e com a lógica "por maioria da razão", sufragamos tranquilamente a jurisprudência mais autorizada que assevera categoricamente (cfr. Acórdão do TUI no Processo n.º 11/2007): O acto consequente de acto administrativo nulo também é nulo.

Tudo isto assegura-nos a colher que não pode deixar de ser nula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concedida às recorrentes, na medida em que no caso sub judice, não há margem para dúvida de que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a referida 5ª arguida que é mãe delas é nula e tal autorização é raiz e alicerce imprescindível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as três recorrentes, sendo esta necessariamente dependente daquela.

1.2. Do arrogado direito adquirido de residência

Reiteremos que o supramencionado Acórdão de condenação penal constata indiscutivelmente que os actos administrativos pelos quais às três recorrentes foi concedida e renovada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foram provocados directamente por condutas subsumidas em cinco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por isso, são nulos.

Determina o n.º 1 do art. 123.º do CPA: O acto administrativo nulo não produz quaisquer efeitos jurídicos, independentemente da declaração da nulidade. Por sua vez, os n.º 1 e 2 do art. 1.º da Lei n.º 8/1999 estabelecem os pressupostos de residir e permanecer legalmente em Macau.

Sem necessidade de explanação mais desenvolvida, destas disposições imperativas decorre, cabal e seguramente, que não pode deixar de ser irremediavelmente infundado o argumento das três recorrentes, no sentido de elas terem

adquirido o direito de residência.

Tudo isto impulsiona-nos a inferir que o despacho in questio não ofende o arrogado direito adquirido de residência, nem infringe o art. 24.º da Lei Básica.

1.3. Da arguida violação de princípios jurídicos

As três recorrentes invocaram a violação dos princípios da protecção dos direitos e interesses dos residentes, da proporcionalidade e da boa fé, arrogando o desconhecimento das condutas criminosas especificadas no Acórdão decretado no Processo n.º CR3-21-0148-PCC bem como a confiança e expectativa legítimas (conclusões m e n da petição).

Subscrevemos tranquilamente a jurisprudência mais autorizada que inculca peremptoriamente (vide. Acórdão do TUI no Processo n.º 54/2011): A Administração está vinculada a revogar os actos ilegais anuláveis, sejam desfavoráveis ou favoráveis aos particulares, com ou sem substituição por outros, a menos que decida proceder à sua sanção (reforma, conversão ou ratificação).

Em esteira e por maioria da razão, extraímos que a Administração fica obrigada a declarar a nulidade do acto administrativo nulo, dado que a nulidade nunca é sanável (arts. 126.º, n.º 1 do CPA e 25.º, n.º 1 do CPAC). Quer dizer que é vinculado o poder de declarar a nulidade do acto nulo.

Ora bem, no actual ordenamento jurídico de Macau encontram-se irreversivelmente consolidadas a doutrina e jurisprudência, no sentido de que os princípios de igualdade, de proporcionalidade, da justiça e de boa fé se circunscrevem apenas ao exercício de poderes discricionários, sendo inoperante nos actos administrativos vinculados. (a título exemplificativo, cfr. Acórdãos do TUI nos Processos n.º 32/2016, n.º 79/2015 n.º 46/2015, n.º 14/2014, n.º 54/2011, n.º 36/2009, n.º 40/2007, n.º 7/2007, n.º 26/2003 e n.º 9/2000, a jurisprudência do TSI vem andar no mesmo sentido).

Nestes termos, e somos impulsionados a inferir que por natureza das coisas, a declaração da nulidade titulada pelo despacho em escrutínio não infringe os princípios da protecção dos direitos e interesses dos residentes, da proporcionalidade e da boa fé.

2. Do recurso do indeferimento do pedido de efeito putativo

No que respeite à decisão de indeferir o pedido do efeito putativo incorporada no despacho em sindicância, as três recorrentes invocaram a ofensa do disposto no n.º 3 do art. 123.º do CPA, bem como dos princípios da protecção de direitos e interesses dos residentes, da proporcionalidade e da boa fé, arrogando que têm tido a boa

fé e a expectativa legítima.

2.1. N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a RAEM, os doutos TUI e TSI vêm incansavelmente sedimentando que o n.º 3 do art. 123.º do CPA confere poder discricionário à Administração (vide Acórdãos do TUI nos Processos n.º 56/2021 e n.º 96/2022, do TSI nos Processos n.º 590/2021 e n.º 833/2021).

Sufragamos a jurisprudência mais autorizada que proclama (a título exemplificativo, vide Acórdão do TUI no Processo n.º 96/2022): 時間的流逝不足以令無效行為產生法律效果。該效果只能「按法律一般原則」產生，如保護信任、善意、平等、公正無私、適度、公正、不當得利及實現公共利益等原則。可以依據這些限制行政當局的原則去解決某一無效行政行為而衍生的不公正情況。

E temos como criterioso o aresto proferido pelo TSI no Processo n.º 265/2015, no qual lêem-se: II. Mas, além disso, essa atribuição de efeitos jurídicos a situações de facto duradouras tem que ser feita "de harmonia com os princípios gerais do direito". E para a densificação desta expressão devem ter-se em conta algumas questões, como a da impossibilidade absoluta de extracção desses efeitos ou a da contribuição do próprio beneficiário para a ocorrência da ilicitude ao abrigo da qual foi proferido o acto nulo. V. Não podem invocar a boa fé perante a acção administrativa se o acto de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se baseou em erro para o qual eles dolosamente contribuíram decisivamente.

2.2. Bem vistas, as orientações jurisprudenciais supra

referidas conotam que é necessário indagar se as condutas e omissões das recorrentes estiveram em harmonia com os princípios gerais de direito, mormente os da justiça, da boa fé e da protecção da confiança legítima. Para estes efeitos, importa ter presente os seguintes factos provados:

2002 年 (具體日期不詳)，第四嫌犯 D、第五嫌犯 E、第六嫌犯 L 及第七嫌犯 J 為著向「貿促局」申請本澳臨時居留權並能惠及較多的家庭成員來澳定居，彼等共同商議後決定及計劃，第四嫌犯 D 與第六嫌犯 L 離婚，第五嫌犯 E 與第七嫌犯 J 離婚，當中，第五嫌犯 E 與第七嫌犯 J 所生的三名未成年女兒 A、B 及 C，由第五嫌犯 E 撫養。之後，第四嫌犯 D 與第五嫌犯 E 假裝結婚，以第四嫌犯 D 作為主申請人申請澳門臨時居留許可，有關申請同時惠及第二嫌犯 I、第五嫌犯 E 和第五嫌犯 E 的三名未成年女兒 A、B 及 C。待各申請人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資格後，第四嫌犯 D 與第五嫌犯 E 解除彼等婚姻關係，彼等各自與原配再婚，及後再向澳門身份證明局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第六嫌犯 L 及第七嫌犯 J 來澳定居 (o 5 facto provado do sobredito Acórdão)。

事實上，第四嫌犯 D 與第五嫌犯 E 註冊結婚後，彼等一直分開居住，且不存在任何夫妻間的感情及生活，以及彼等各自與原配繼續共同生活 (o 9 facto provado)，此後，彼等為著逃避有關當局的調查，第四嫌犯 D、第二嫌犯 I、第五嫌犯 E、A、B 及 C 均居住在澳門 XX 大馬路 XX 第 XX 期 XX 花園第 XX 座 XX 樓 XX 室內，以營造共同生活的假象 (o 16 facto provado, sublinhado nosso)，事實上，第四嫌犯 D 與第五嫌犯 E 分房居住，彼等並不存在任何夫妻間的感情及生活。同樣地，第四嫌犯 D 與 A、B 及 C 之間，亦不存在任何父女的感情及生活 (o 17 facto provado, sublinhado nosso)。

Repare-se que são a 5ª arguida a mãe das três recorrentes e o 4º arguido o irmão do pai biológico delas

(o 2º facto provado), quer dizer que o 4º arguido é o tio germano delas, por isso, não há margem para dúvidas de que elas vêm ter pleno conhecimento da identidade do 4º arguido.

De outra banda, impõe-se ter presente que ao obter, pela primeira vez, os bilhetes de identidade da RAEM em 15/09/2004, eram a 1ª recorrente de 17 anos e 8 meses, a 2ª de 12 anos e 8 meses e a 3ª de 11 anos, dado que elas nasceram respectivamente em 24/01/1987, em 08/01/1992 e em 19/09/1993 (docs. de fls. 391 a 395 do P.A.).

Reflectidos em consonância com as idades das recorrentes e com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comum, todos os factos provados acima referidos levam-nos a colher tranquilamente que é absolutamente desacreditável a versão de elas não saberem o ardil dolosamente criado por sua mãe e tio germano. Daí flui que é manifesto falso o art. 40.º da petição que diz: 正如上述重複的提及，司法上訴人並不知悉，亦沒有參與虛假婚姻的違法行為，而其等不知悉違法的事實亦證明其等在此批給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中為善意地行事。

Na audiência, petição inicial e alegação facultativa, não se divisa nenhum remorso, pelo contrário, o que as recorrentes vêm insistindo no presente recurso consiste em arrogar a boa fé e a expectativa legítima, e em assacar ao despacho in questio a violação dos princípios da protecção de direitos e interesses dos residentes, da proporcionalidade e da boa fé.

Tudo isto implica cabalmente, que as recorrentes ainda não têm a sensibilidade da culpa delas, a arguição 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boa fé não pode deixar de ser ilegítima, e o despacho impugnado nestes autos não infringe este princípio.

2.3. Recorde-se que os factos provados no sobredito Acórdão de condenação penal constata, com firmeza, que as três recorrentes vêm ter o inegável e pleno conhecimento das condutas pelas quais a mãe e o tio germano delas - respectivamente a 5ª arguida e o 4º arguido - foram condenados em praticar, na coautoria material, cinco crimes, continuados e consumados, da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p.p. pelo n.º 2 em conjugação com o n.º 1 do art. 18.º da Lei n.º 6/2024.

E é de destacar que ao adquirir o estatuto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da RAEM, todas as três recorrentes eram já maiores e que os 5, 16 e 17 factos provados demonstram inequivocamente que a 5ª arguida, o 4º arguido e as três recorrentes são pessoas muito espertas.

Sendo assim, não há dúvida de que as recorrentes podiam e deviam providenciar o Plano-B para a hipótese de ser descoberto o ardil dolosamente praticado por 5ª e 4º arguidos, pelo que lhes é ilegítimo arrogar a expectativa legítima e elas três devem suportar a consequência de perder o estatuto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dado que o ardil

dos 5ª e 4º arguidos é a fonte e raiz original dessa consequência. Daí resulta seguramente que o despacho in questio não infringe 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ou o da protecção de direitos e interesses dos residentes.

Por todo o expendido acima, propendemos pela improcedência d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

終審法院在案件編號為 21/2004 的合議庭裁判中表示：“...在撤銷性司法上訴中檢察院司法官不是當事人。因此，沒有法律規定妨礙法官以認同檢察院文本內容來說明裁判理由...”。

檢察院助理檢察長已就本司法上訴中提出的所有問題發表了詳盡且精闢的意見，本院合議庭同意採納有關意見，並在此視為完全轉錄。這些意見為解決本司法上訴提供了充分的依據。

基於此，本院裁定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司法上訴人 A、B、C 針對行政長官提起的**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並維持被質疑的行政行為。

司法上訴人需承擔 8 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登錄及作出通知。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4 年 11 月 14 日

唐曉峰
(裁判書製作人)

盛銳敏
(第二助審法官)

Rui Carlos dos Santos P. Ribeiro (李宏信)
(第一助審法官)

(Vencido nos termos do voto de vencido ao processo 1013/2019)

米萬英
(助理檢察長)